

摘要

在先秦典籍中，「貞節」的記載已出現。自古「男尊女卑」、「從一而終」的觀念即已存在於中國社會中。宋代理學家所強調的無非是心性、理氣的反覆辨證與探討，焦點並未集中在婦女身上。

程頤是程朱學派的創始者，曾言：「涵養須用敬，進學在致知。」其中「涵養須用敬」是極重要的修養功夫，是一種道德陶冶的精神修為，而「敬」更是可以擺脫紛擾心靈、去除雜亂人欲的妙方。正因為程頤格外強調內心的修養，並以為道德純化後的實踐確有其必要性，是以較容易產生「餓死事極小，失節事極大」之言。南宋朱熹大抵繼承程頤的理欲觀，持續強調格物窮理，追求真理，講求修己治人之方，關懷如何化民成俗，並體悟出：「聖人千言萬語，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」的道理。故言「存天理去人欲」。

朱熹以後，「餓死事極小，失節事極大」這段話在學術界一直未受到任何挑戰，甚至在明、清之際產生極度發酵作用，朝廷更公開表揚烈婦、節婦的行為，讓守節成為眾人心目中的「應然作為」。直到清代戴震反理學的思想出現後才聽見批評的聲音。而後，由於西風東漸，透過康有為、胡適等人的批判，婦權漸受重視，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」遂被認為是不當的觀念。朱學門人黃榦、真德秀大抵承繼程、朱二人之理欲觀，對程朱學說之發揚可說不遺餘力，然而二人皆並未針對程頤或朱熹的婦女貞節思想加以發揚，真德秀僅重申漢代即有之「從一而終」概念，黃榦更是未提及與守節相關的隻字片語，程朱後學並未將二人之婦女貞節思想列為主要學說，可見婦女守節並未程朱二人之思想重點。

在文學與史學觀察上，民間婦女與士大夫階層婦女在貞節觀實踐上，有相當的差距存在；而士人鼓吹或女子教育在婦女守節的落實上也並未呈現正相關。《夷堅志》或宋代的筆記話本小說，儘管在婦女守節觀念上具有教育或警惕意義，但礙於實際生活需要，守節婦女的內容在全書比例上仍不高；而《宋史》中的列女人數亦只有卅八人而已；《福建通志》的宋代記載，人數也遠不及明代，可見宋代婦女在貞節觀上並未出現急遽轉嚴的趨向，而與程朱學派互相參照下，則發現程朱學者的提倡以「存天理去人欲」為主。對婦女貞節觀的期許，也只是提升士大夫階層節操概念的一環而已，與婦女守節被實踐與落實仍存在相當的差距。